

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

本期栏目主持人:刘岳兵教授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主持人语:在近代之前,日本大量吸收中国文化,但是在其制度建构与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中都打上了日本自己的烙印,保持了自己的风格。近代西洋来迫,中国首当其冲。西方传教士或中国学者著述了各种关于西方历史、地理著作及《英华字典》、《英华通语》等工具书,这些汉文著作对幕末日本知识分子海外知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近代日本处在中西两大传统之间,从一些有识之士强调将东西文化融合并打成一片,到以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东方文化的领导者自居,继而“仓促地把自己的文化和来自西方的文化进行交易”(霍尔《日本史》)、“脱亚入欧”,加入到西方列强的队伍中,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的交流及相互影响,其深度与广度,其错综复杂的程度,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中日著作互译,由于国情不同,不同时期的状况也各不相同。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而译日本的书又是一个捷径,如康有为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甚至认为如果能够早将“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日本书目志·自序》)与中国欲“坐而食之”以求自强、免遭宰割的境况相比,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跻身世界列强,而知识、出版界面对维新以来热衷于输入西洋新学术而置日本传统与中国古典于不顾的倾向,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汉文作为日本的“第二国文”,认为汉籍对于加强“伦理的信念”、培养“高尚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感化作用。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的《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和富山房出版的《汉文大系》两套丛书自1909年出版之后,一再重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日本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的中国因素,或者说中国因素在日本近代知识建构中的意义如何,近年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船山史论与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一文主要以充分体现王船山史观的《宋论》在近代日本的翻译出版这一个案为例,探讨汉籍的翻译与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关系,对于理解近代中日文化的对话、深化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夫妻关系,是人道之大伦。和其他人际关系一样,夫妻关系不仅有权利的因素,还有情感、伦理的因素;不仅有自然的属性,更有社会的属性。由于夫妻是构筑家庭的基础,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直接与社会、国家秩序的治理紧密相关。周晓霞的《从“夫妇有别”到“夫妇相和”:近代日本两性关系的形塑》一文梳理了近世以来中日知识分子对夫妻关系理解的大致轮廓,以及日本近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中传统的“夫妇有别”观念如何转换到“夫妇相和”的过程及其种种解释的意义,为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生面。不同的观念,其产生反映了怎样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其影响又是如何落实在新的制度建设中并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的?对日本社会文化的了解,中国只是一个参照,只有“切切实实地钻到他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功夫”,否则不足以谈中日文化比较,也自然不“足以供治国者参考的”。

作者简介:刘岳兵,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及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